

理论探讨

# 对正义战争伦理观的理性思考

黄亮<sup>1</sup> 刘焕秀<sup>2</sup>

(1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2 65066部队,辽宁大连 116100)

[摘要] 正义战争理论作为评判战争的合法性的依据之一,其理论本身不断发展创新,从基督教正义战争伦理观到资产阶级战争伦理观再到无产阶级战争伦理观,无不彰显人类对于战争的正义问题的理论与现实关怀。本文从理论源流的角度梳理了正义战争理论的发展脉络,以求对此问题深入探讨。

[关键词] 战争伦理;正义战争;正义

[中图分类号] E0-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53(2005)06-0051-02

战争作为人类文明挥之不去的阴霾,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用以解决不同利益集团(氏族、部落、阶级、阶层、民族、国家乃至国家集团)间矛盾的有组织的暴力斗争。”<sup>1</sup>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平是人们永久的渴望,战争伦理作为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不断考量着人类的理性与智慧。战争伦理是社会集团及其武装成员在政治交往中,针对组织化暴力对抗所遵循的暴力使用的行为规范体系。其意义是在已经或可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用以协调对抗双方各种重大的社会价值关系,缓和政治交往的矛盾;其维系的力量来源于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集团的自我信念。从历史上看,战争伦理研究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正义战争伦理观、和平主义战争伦理观以及战争无伦理差别的思想(主要是现实主义和军国主义战争伦理观)。研究正义战争伦理观对于我们正确的分析和看待世界上纷争不断的各种战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 一、正义战争伦理观的由来

1. 正义战争伦理观的源头。正义战争理论最早出自于《旧约》。《旧约》认为,由上帝指令的战争是正义的,对战争行为也有着限定的规则。伊斯兰教中,以“圣战”为核心的正义战争学说也是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基督教正义战争理论是由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根据《圣经》“路加福音”的有关战争的内容,以及有关基督教先知的战争传说而构建的。这种理论强调正义战争必须满足3个基本条件:正当的理由( *causa iusta* ),实施和控制战争的合法权力机构( *potestas legitima auctoritas principis* )和有关战争目标的正确意图( *intentio recta* )。同时该理论又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并且是神圣的,上帝授意发动的战争不可能是邪恶的。这样,两者结合便构成了基督教战争伦理观的基本内容。而后者又是整个基督教战争伦理的核心。托马斯·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命令的战争是正义的,要由合法权力来宣战,宣战也必须有正当的理由。他说,战争的真正邪恶是对暴力的热爱、报复的残忍、凶暴而无法平息的憎恨等等。阿奎那在此基础上更清楚的表明:出于保护自身生存的目的杀死进攻者是自我防卫行为,是正当的。在诉诸战争的情况时,就要求有正当意图。这意味着扬善避恶,纯粹出于正义原因,而法律权力不足以应付。

2 资产阶级正义战争理论的创立与发展。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在资产阶级人文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上帝被彻底抛弃,基督教的正义战争理论也被普遍的、抽象的原则和道义取而代之的。理性的分析融入到对战争的道德思考,与战争相关联时,法律和道德两者的内在关系成为思考的新的增长点。国际法(确切说是战争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战争法的早期讨论中,有两个主要关心的问题。一是处理开战正义的问题( *jus ad bellum* )。开战正义是要首先建立起诉诸战争的规则。另一个是处理战时正义的问题( *jus in bello* )。这是要在战争一旦爆发时,建立起战争行为准则。后者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屠杀平民的合法性、战犯的处理、化学毒品的使用、财产的分配等等。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17世纪的格劳修斯( *Hugo Grotius* )和18世纪的瓦忒尔( *E. Vattel* )是当时的代表人物。格劳修斯说:只为了达到或重建人类的自然目标——和平或平静安宁的社会生活条件,而不是为了个人或集团的自我扩张,为此发动的战争就是正义的。他甚至认为:反对真正野蛮人的战争是自然所允许的,“文明化的战争”在极端情况下是正义的。<sup>④</sup>瓦忒尔指出:“如果非正义战争能导致非法权力的话,公认法官不同意,就没有确定领地可以从战利品中获得,因为国家之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决定战争的正义;这样将永远可以要求讨回战利品,就像强盗抢走货物一样。”<sup>⑤</sup>这暗示了即便战争是非正义的,通过战争获得的领土也应该被视作是合法的。事实上,这也正是历史上许多国家的行事方式,欧洲、美洲的殖民国家正是通过非正义的手段抢夺暴敛巨额财富并据此据为己有。

3 无产阶级正义战争理论的创立与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察和分析战争,形成了以实现人类彻底解放为目标的新型正义战争伦理观。这种伦理观强调:(1)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在阶级社会中,战争“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sup>⑥</sup>当阶级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战争。(2)不能一概否定战争,“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sup>⑦</sup>。(3)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衡量战争正义与否的根本标志,不是抽象的主观道德原则,而在于这种战争是促进社会进步还是阻碍社会进步。(4)战争是复杂的,一场具体战争可能同时具有两种性质,也可能会从一种性质转化为另一种性质。因此,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一般来说,被压迫阶级和代表无进生产力的阶级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压迫阶级和代表落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阶级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和他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争伦理观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的战争伦理思想。列宁认为:把握战争的性质应从“这个战争具有什么

[收稿日期] 2005-09-20  
[第一作者] 黄亮(1982-),男,南京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样的阶级性,它是因什么爆发的,它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sup>④</sup>,即分析战争的政治目的、进行战争的阶级和战争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及作用等三个方面。从战争的政治目的上看,“如果政治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就是说,它保护金融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和别的国家,那么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治是民族解放的政治,就是说,它反映了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那么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便是民族解放战争”。<sup>⑤</sup>前者是非正义的,后者是正义的。从进行战争的阶级上看,出于不同阶级进行的战争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被压迫阶级和先进阶级所进行的战争一般是正义的,而压迫阶级和没落阶级所从事的战争一般是非正义的。从战争的具体历史条件和作用上看,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要求,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战争从根本上说具有正义性,反之则是非正义战争。由此,他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作了具体的区分: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非正义战争,而革命战争是正义战争。

## 二、现代正义战争论的伦理学阐释

现代正义战争论认为,所有的国际关系,包括战争,都受某些得到广泛承认的道德标准的指导。武力和暴力虽然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手段,但对它们的使用必须要接受某些基本的伦理原则的约束。正义战争论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正义的战争,二是战争中的正义。前者关注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动一场战争是正义的;后者关注的是,在一场战争中,正义的一方对武力的使用应受到哪些伦理限制。

现代正义战争理论的领军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瓦尔泽(Walzer M.),他的代表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Just and Unjust War》)也成为探讨正义战争论的经典。与其他思想家相比,瓦尔泽更加关注开战正义问题,但他同样假定战争是正义的,虽然他有时认为侵略只是赞成武力抵抗的前提,但他通常肯定侵略行为足够证明求助战争的正义。比如,他说“侵略行为只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证明有力抵抗是正当的”;他还说“侵略是单一的无差别的罪行,因为无论以什么形式,它都挑战了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权利。”<sup>⑥</sup>瓦尔泽强调,只有为了维护权利不遭侵犯而开战才是正义的,而且他扩展了侵略这个概念。瓦尔泽探究了开战正义和战时正义之间的关系,于是提出了“极度紧急时刻”。他觉得这两个领域内的正义有时可能是冲突的。当发生冲突的情况时,在某些情势下,因为要促进开战的正当理由,可能会违背指导战时行为的原则。

瓦尔泽对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与预防性攻击(preventive strike)也做了区分。他认为,如果甲国面临着来自乙国的明确的、迫在眉睫的攻击,那么,甲国可以首先攻击乙国。所谓明显,是指乙国的政府文件、报告和声明,以及各种情报都表明了乙国攻击甲国的意图。所谓迫在眉睫,是指乙国对甲国的进攻将在数天或数小时内发生。而所谓预防性攻击则是指,当乙国进攻的威胁不是迫在眉睫的,而是有可能在几个月或数年后才出现的情况下,甲国就首先向乙国发动进攻。瓦尔泽认为,预防性攻击是不正义的,而先发制人则是正义的。

## 三、正义战争伦理观的局限

从正义战争伦理观起源和发展历史来看,正义战争伦理观的目都不是消除战争和暴力,而是试图给我们提供一些规范,使我们能够判断,在什么条件下战争和暴力是能够得到道德证明的,以及正义的战争应当受到怎样的道德限制。这为我们理解和评估国际关系中武力使用的道德性提供了一个道德构架。它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各民族国家的实践需要。但是,正义战争伦理观也有它的局限性。

1. 伦理观上的认识盲点。正义战争伦理观可能导致“战争双方都有可能是正义的”这个双难问题的出现。正义战争伦理观本身的内部争论构成了这个问题的自反性。因为对于正义可能有两种认识:一是客观认识,认为正义是指战争之确实的道德地位,不管人们是否认为战争是正义的,它不受其影响;另一个是主观认识,即如果通过全然无知来相信

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就是正义的,即便事实上是客观的非正义的。正义战争论与国际法理念有一致之处。例如,它们都承认: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任何国际都有义务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民族国家有责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但也有权使用武力进行自卫。国际法体系确定了一套用于确定各国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体系,但是,在各文化传统对正义的理解尚存在分歧、各国之间对某些国际争端的解决尚未形成道德共识的情况下,正义战争论为超级大国利用其军事优势追求它们所理解的“正义”的霸权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辩护。正义战争论对先发制人战略的肯定,更是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行为提供了借口。

2. 漠视无辜者的生命权。正义战争论把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视为最重要的价值,甚至不惜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更为严重的是,任何一场战争都会导致大量无辜者的死亡(即使是美国最近对伊拉克的以最先进的精确制导武器为手段的“外科手术式的”战争,都导致了数千伊拉克平民的死亡)。进攻的一方也许不是“蓄意”杀死平民,但绝对不能说他们是“无意的”,因为他们事先就已经预见到会有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我们能证明这种“预知的大量杀死无辜者”的行为的合理性吗?和平主义者认为不能,因为,无辜者维护其生命的权利,要优先于战争主体那种为维护某些道德价值而大量杀死无辜者的权利。预知的大量杀死无辜者的行为明显地是错误的,而对这种行为进行限制则明显地是正确的。

3. 正义战争者主张的那些“战争伦理”在实践中很难得到遵守。首先,我们很难断定,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动机是否真的如它们所宣称的那样纯正。其次,战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要在战争发生之前准确地预测和评估战争的利弊得失(对称原则)往往是很困难的。再次,不同国家对于和平手段能否实现,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预期的目标,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些在军事上具有较大优势的国家,常常没有耐心去等待和创造和平措施能够发挥效率的条件。它们早早地就关上了和平的大门,而宁愿选择先发制人的战略。这使得“战争必须是最后的手段”这一原则在现实中很难得到遵守。最后,在现代社会,随着军事设施与民用设施的日益一体化,我们已很难把军事目标与民用目标区别开来。正义战争论的区别原则很难得到落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也使得“非战斗人员豁免原则”形同虚设。正如一位承认正义战争论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以往的战争中,对军事手段的绝大多数使用都被证明是不正义的。例如,美国之卷入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巴拿马,苏联之卷入阿富汗,以色列之卷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都违背了正义战争论关于正义的事业与正义的手段的规定。甚至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也违背了正义战争论关于正义的事业和正义的手段的条款。事实上,在现代史中,人们很难找到合理地运用正义战争论的例子。”<sup>⑦</sup>

## 注释

<sup>1</sup> 马德宝著:《现代战争与和平基本问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sup>④</sup> 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页

<sup>(四)</sup> 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国家法》), p. 304

<sup>1/4</sup>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sup>1/2</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7页

<sup>3/4</sup>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sup>⑧</sup>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sup>(七)</sup> 瓦尔泽:《just and unjust war》pp52-53(《正义的与非正义的战争:历史视野中的道德论据》哈珀科林斯出版公司,1977)

[责任编辑:李丹]